



# Solving a Disputed Topic about Novel Theor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Overlap of Guan Daru's *On Novel* and Lü Simian's *Serials on Novel*

Wu Guoyi

**Abstract:** Guan Daru's *On Novel* and Lü Simian's *Serials on Novel*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two most systematic theses on novel theor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cholars after them noticed and discussed heatedly about the apparent overlap of their ideas, contents, and writings between the two works without agreement for a long time. It so became a historical dispute. Learning from Lü Simian's *Diary*, we know that Guan and Lü were close relatives. Guan was Lü's elder male cousin. They shared common interests, organized a poetry club and cultivated friendship when young. Later they corresponded to each other frequently, which testified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There is an incomplete manuscript in Lü Simian's posthumous work, which in fact is the second and fourth chapters of Guan's work, "Categories of Novel" and "Positioning Novel in Literature". So Guan Daru's work was not composed on his own, and Lü Simian was an important co-author.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Lü Simian is the real author and merely published the work in the name of Guan. Therefor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when Lü wrote his *Serials on Novel*, he inherited and revised his previous writings. With two-year careful consideration, Lü felt not content and decided to extend his statement, thereby finishing his *Serials on Novel* with 30,000 character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he introduced western theories in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novel tradition which was endowed with new meanings. He not only sorted out the novel criticism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and drew a systematic conclusion, but also further interpreted the major problems in novel theory and in his previous argument, thus extending the scope and depth of novel theory. In addition, the two works were considered to be high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have become the model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novels. In fact, just like how he taught commercial economy and commercial geography, in writing articles on novel theory, he turned to some Japanese works for reference. At that time, very few western aesthetic or literary works were translated directly into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rmediary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pproaches of Lü to access such works.

**Keywords:** novel theory; Guan Daru; Lü Simian; *On Novel*; *Serials on Novel*; new exploration

**Author:** Wu Guoyi graduated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8 and is now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History Department of ECNU.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abou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history, studie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n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Four Editions of General Introduction on Historiography*;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n Guo Yu*, and proofreading and annotation on *Complete Collection of Wang Guowei*.

# 破解民國初年小說理論界的一樁公案

## ——管達如《說小說》與呂思勉《小說叢話》因襲雷同問題

鄒國義



[摘要]管達如《說小說》與呂思勉《小說叢話》兩文被認為是民國初年最為系統的小說研究專論，但後人也注意到了兩者在思想、內容乃至文字論述上存在着明顯的因襲雷同問題，並對此衆說紛紜，長期沒有定論，成為一樁歷史公案。從呂思勉的《日記》得知，管、呂兩家是十分親近的姻戚，管達如是呂思勉的表兄，兩人在青年時代意氣相投、共結詩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一直書信往來，關係非比尋常。現存呂思勉遺稿中有一殘稿，包括了管達如《說小說》第二章《小說之分類》、第四章《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的基本內容。這說明，管達如《說小說》實際上並非管氏一人

所撰，呂思勉是重要的合作者。同時，也不排斥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此文的真正作者是呂思勉，管達如祇是“署名”作者。此後，呂思勉在寫《小說叢話》時，襲用、改寫自己前面所寫的文字內容，也就可以理解乃至是十分自然的事了。經過兩年的深入思考，他感到意猶未盡，有必要再加以申說，故在《說小說》的基礎上撰寫了長達三萬餘字的《小說叢話》。此文最重要的特徵，是將西方理論引入了中國小說傳統的分析中，而賦予其新的內涵與意蘊。在文中，他不僅對晚清以來主要的小說批評觀點作了比較系統的梳理與總結，而且對以往小說理論研究中的主要問題，包括自己的原先之論，也作了進一步較前更為深入的闡發，從而拓展了其有關小說理論的視域寬度與理論深度。可以說，此文和之前的管達如《說小說》都代表了當時中國近代小說理論批評發展的水平，並成為近代小說理論研究的典範之作。至於學術界多認為《說小說》與《小說叢話》的寫作受到了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其實，他撰寫有關小說理論方面的文章如同他教授商業經濟、商業地理那樣，是“參考”了一些日文方面的論著。在當時漢譯西文美學、文藝理論譯本十分稀缺的狀況下，呂思勉的一些西方美學、文藝思想是通過日文論著的中介得來的。

[關鍵詞]小說理論 管達如 呂思勉 《說小說》 《小說叢話》 新探

[作者簡介]鄒國義，1988年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歷史文獻學、20世紀學術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史學通論四種合刊》、《國語譯註》，參與《王國維全集》的點校整理。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在中國的小說理論界出現了兩篇重要論文，一篇是管達如的《說小說》，另一篇是“成之”即呂思勉（1884—1957）的《小說叢話》。誠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它們是“比較系統的理論著作，對小說的多方面問題作了研究和總結，在我國小說批評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sup>①</sup>。因此，在一些有關論著中，往往列有專門的章節予以論述。但人們也注意到了兩者在思想、內容乃至文字論述上存在着明顯的因襲雷同問題，並對此衆說紛紜，長期沒有定論，成為百年來中國小說理論界的歷史公案。本文試圖以呂思勉的《日記》、手稿等新材料，以及當時的報刊，對這樁公案進行破解，並對兩文相互間的關聯作出一些迥異於以往的闡釋。

## 一 管達如其人行述

《說小說》一文連載於當時影響頗大的《小說月報》1912年第5、7—11號，署名“管達如”。全文共分為六章，探討了小說之意義、小說之分類、小說之勢力及其風行於社會理由、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翻譯小說及其與本土小說之比較、中國舊小說缺點及今日改良方針等問題。然而，關於作者管達如，學術界一直沒弄清楚其人是誰；甚至還有一種誤解，認為是原南社社員管際安。1985年出版的《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最早註釋說：管達如，“疑即管際安（1892—1975），字義華，一字霽庵，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南社社員，曾任《民權報》、《民國日報》編輯。他是小說家許指嚴的學生，與李定夷、趙苕狂等同學，喜評劇，能昆曲，著有《昆曲曲調》等”<sup>②</sup>。同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1993年出版的《近代文學批評史》，20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冊），也基本是這一介紹。<sup>③</sup>此說影響甚大，為不少論著所採納。<sup>④</sup>

不過，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一說法不正確，管達如實有其人。辛小征、靳大成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中指出：“有趣的是，成之（呂思勉）與管氏之間還有着一層遠親的關係。呂誠之在十七歲時認識了從母兄管達如，而管氏當時師從謝鍾英先生。謝氏治史，以考證聞名，亦喜談縱橫家言與法家言，成之與管氏卻棄縱橫而言法家。成之後來以史學為主業，但對南北朝文學亦頗有研究心得。”<sup>⑤</sup>其所據出自呂思勉的《自述》，雖說祇是在論及呂思勉時順帶提到管氏，但對以往的說法卻是一種糾正。

正如辛小征、靳大成所说，管達如與呂思勉之間的确有着非同尋常的關係。先看呂思勉在《自述》中提到的管達如：

年十七，始識從母兄管達如君，管君為謝鍾英先生之弟子。鍾英先生者，利恒君之父，予識利恒君，亦在此時也。鍾英先生亦治史學，以考證名，而實好談舊日之經濟。其言治道，信法家及縱橫家之學。予自達如君獲聞其說。惟予與達如，均不信縱橫家，祇服膺法家耳。法家之說，細別之，又可分法、術兩派，而予所服膺者，尤為術家。<sup>⑥</sup>

再看他在《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中所言：

- ①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冊，第699頁。
- ② 黃霖、韓同文選註：《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下冊，第349頁。
- ③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636頁；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下冊，第561頁。
- ④ 例如，羅樹華、陶繼新等主編的《小說辭典》（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90），王志彬《20世紀中國寫作理論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劉良明、黎曉蓮、朱殊《近代小說理論批評流派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以及一些相關的重要論文，均採用了這一說法。漢學家、多倫多大學教授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在《創造嶄新的小說世界——中國短篇小說（1906—1916）》中說：“1911到1916年，新的美學思想達至發展的峰巔。魯迅（1881—1936）、管達如（1892—1975）和成之（呂思勉，1884—1957）幾乎是同時發表了三篇重要論文”云云，並稱：“管達如的文學專論《說小說》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時，他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這位文學青年已然構思出一個理論上很前衛的‘理想界’概念。”參見陳平原、王德威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86、487頁。
- ⑤ 辛小征、靳大成：《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第二部上卷，第137頁。註出《蒿廬問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第222—223頁。
- ⑥ 呂思勉：“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呂思勉遺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上冊，第439頁。

十七歲，始與表兄管達如（聯第）相見，達如爲吾邑名宿謝鍾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觀），間接得聞先生之緒論。先生以考證著名，尤長於地理，然間接得先生之益的，卻不在其考證，而在其論事的深刻。我後來讀史，頗能將當世之事，與歷史上之事實互勘，而不爲表面的記載所囿，其根基實植於此時。<sup>①</sup>

在自述治史的過程與經歷時，呂思勉又說：

十八歲，我的姨丈管凌雲（諱元善）先生，即達如君之父，和湯蟄仙（壽潛）先生同事，得其所著《三通考輯要》，勸我閱讀。我讀過一兩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輯要》對讀，以《輯要》爲未足，乃舍《輯要》而讀原本。後來又把《通典》和《通考》對讀，並讀過《通志》的《二十略》。此於我的史學，亦極有關係。<sup>②</sup>

由此可知，管達如的父親管元善在青年呂思勉問學過程中也有過不小的影響。

管達如（1882—1941），名聯第，字達如，小字達官，江蘇常州人。其祖上是滿州貴族。據張維驥《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記載，其父管元善，字凌雲，常州府學附生，考充國史館贍錄。但科舉考試屢試不售，後納貲捐布政司經歷，分發福建省委用。1884年中法戰爭時，劉銘傳調其赴臺灣差遣，留置幕府，1894年出任臺北府知府。中日甲午戰爭後，仍回福建省辦事，歷任興化、邵武、泉州知府，延建邵兵備道、興泉永兵備道。民國成立後歸里，1916年逝世。史稱其“精於吏事，練達人情”，從政數十年，所至有聲，輿情融洽，“清正無私，故解組歸來，仍如寒素”。<sup>③</sup>就其家庭而言，育有二子二女，長子即管達如，次子管文如，名聯玉。

管達如出身於仕宦之家，早年隨父在官。他少時好學，聰明穎悟，年十歲時，其親戚洪述祖題扇面一柄贈之，詩曰：“訂交老鳳廿餘年，小鳳清聲又眼前。卻識松原生泰嶽，早知玉自出藍田。功名後日方無量，頭角於今已巋然。聊以鄰侯爲爾祝，相期富貴更神仙。”<sup>④</sup>稱其如清聲小鳳、藍田之玉，已巋露頭角，日後前程不可限量，對其寄予厚望。後他回到故鄉常州，爲謝鍾英之弟子。其師謝鍾英（1855—1901），江蘇常州人。史稱其“刻苦勵學，尤好輿地家言”，“博涉經史百家言，深究古今治亂興亡之故”。光緒十四年（1888）中舉，旋被江蘇布政使黃彭年（1824—1890）邀至蘇州論政講學，次年被張之洞（1837—1909）延爲幕僚。繼應臺灣巡撫邵友濂（1841—1901）之聘，赴臺幫助整理臺南鹽務。後以知縣銜分發湖南。戊戌政變後，回里授徒講學，“重理百家之言，兼綜易老岐黃”，並撰有《三國疆域志補註》等論著。<sup>⑤</sup>如呂思勉所說，謝氏“精輿地之學，工古文辭，爲世名儒”<sup>⑥</sup>，在其《日記》中又說到：“吾鄉謝鍾英先生，邃於史地之學，予從母之子管達如，先生之弟子也，於先生最服膺。”<sup>⑦</sup>管達如爲其弟子，在這方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訓練。

在常州的一段時期中，呂思勉與管達如的關係相當密切。就呂氏與管氏兩家關係而言，他們是十分親近的姻戚。呂思勉的母親程棲，字仲芬，號靜岩，是武進名士程兆縉的次女。在呂氏所撰《外王父程君傳》中，說到程兆縉：“無子，有兩女，長諱綺，字少霞；次諱棲，字仲芬，吾母也。”<sup>⑧</sup>程兆縉的長女程綺嫁與管元善爲妻，呂思勉稱管元善爲姨丈，與管達如則爲表兄關係。<sup>⑨</sup>管

<sup>①</sup> 呂思勉：“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08頁；原載於《中美日報》“堡壘副刊”1941年第160—163期。

<sup>②</sup> 呂思勉：“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09、410頁。

<sup>③⑤</sup> 張維驥編纂：《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上海：常州旅滬同鄉會，1944），下冊，第6—7、23—24頁。

<sup>④</sup> 後有識語云：“達官世講岐嶷好學，今歲爲十齡初度，既饋佳餚，復贈湯餅，輒援古人之例，題扇爲贈，即以爲他年左券也可。”（呂思勉：《殘存日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第228頁）。

<sup>⑥</sup> 呂思勉：“謝利恒先生傳”，《中國醫學源流論》（上海：澄齋醫社，1936），第1頁。

<sup>⑦</sup> 呂思勉：“日記七·謝鍾英”，《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22頁。

<sup>⑧</sup> 呂思勉：“外王父程君傳”，《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749頁。

<sup>⑨</sup> 呂思勉《日記·呂黻庭》載：其族祖呂黻庭客臺灣而沒，“歲甲申（1884），余從母之夫管凌雲元善先生客福建，予母託其詢訪，不得確息。戊子（1888），凌雲先生客臺北，又託之，復書曰：‘臺南並無法下寺，何來棺柩，疑惑而已’，也可見之前兩家關係之近。

氏比呂思勉年長兩歲，既是親戚，彼此年齡相仿，又得以交結其師謝鍾英之子謝觀（字利恒），因此三人意氣相投，關係十分熟稔，在青年時代結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誼。

據現存呂思勉1901年《殘存日記》記載：“辛丑三月初三，達如來，述陽湖三覆題曰：‘露所隊凡有血’，真可謂割截無理矣。”<sup>①</sup>說的是管達如來與呂氏談起此年常州府科舉考試所出之題，呂思勉認為題目出得宰截割裂，很沒有道理。當時他們正在作應舉文字，但已對八股文章表示了不滿。如呂氏後來《日記》所說：“時文有極謬者，己亥（1899）武進縣試，正場次題教以人倫。一卷起講，以父子聚麀作反筆起，真堪發一大噱。”<sup>②</sup>對科舉考試及時文之荒謬，已有所譏刺，也反映出他們當時對科考制度的一些反叛精神。

當時管達如、呂思勉兩人均對詩詞的創作很感興趣。呂氏自十七歲起開始學習填詞作詩，在數年間對詩詞的創作興致很高，曾參與同邑莊通伯主持的“人隱詩社”的活動。管氏也很喜好撰寫詩詞，共同的興趣愛好將他們結合在一起。在這段時間裏，他們經常在一起詩詞唱和，十分相得。如呂氏1902年《日記》記載：壬寅三月二十二日，“是日和達如《木香詞》云：清明過了，看亭亭架畔，素娥青女。爲愛春寒偏耐冷，裁向簷前幾樹。嬌額曾塗，檀心未謝，香雪闊飛舞……”<sup>③</sup>在同年《日記》中，還記載着他與父親以及學友管達如等同遊丹陽，一路上作詩唱和、以此爲樂的情況：

去（丹陽）時在舟中，詩舲有《臨江仙》一詞，先君、少木兄、達如及予均次其韻，予所作至今尚能省記：“霧淨煙沉波似練，蘭橈遙指空江。晚涼吟盡聽寒蟬。歸鴉零落處，雲樹亂千行……”此外，惟記達如詞，有“驛橋燈火處，零落不成行”之句，爲同人所賞。達如又有《念奴嬌》一詞，有“人語驛橋天欲暝”句，亦爲同人所賞。予戲謂達如，君可稱管驛橋也。<sup>④</sup>

“詩舲”即武進書法家左詩舲（左權），呂思勉和作即《臨江仙 壬寅舟泊丹陽次詩舲韻》，見呂著《誠之詩稿》油印本。<sup>⑤</sup>由上述記載來看，在呂思勉的那些詩友中，管達如的詞作受到了同人的一致讚賞，呂氏很欣賞他有關驛橋描寫之句，因而戲稱他爲“管驛橋”。

在現存呂思勉的遺稿中，還存錄有當年管達如的幾首詞作。此年四月初五，管達如有詞作《青玉案 廿一年初度》：

鬢齡荏苒隨春去，誰伴得，愁人住。溟海游塵江上路，怎生消遣？斜風細雨，廿一番春暮。春心掩亂如飛絮，春事闌珊空自苦。煙柳迎風千萬縷，許多幽恨，許多悽楚，向我偏閑舞。

由此倒推，可知管達如生於光緒八年四月初五，即1882年5月21日。<sup>⑥</sup>管氏又有《卜算子》詞云：

殘月下窗櫺，有恨無從訴。一枕黃粱未熟時，好夢留人住。驚醒轉口口（缺），卻又無情緒。料定今朝不放晴，日影明庭樹。

雖說其所抒發的情感，還不脫傳統文人寫作的藩籬，但就這些詞作來說，還是反映出管達如具有相當出色的文學造詣，這對於他此後的寫作是很有影響的。

當然，除詩詞唱和之外，如前呂氏所述，他們還一起討論過先秦諸子之學。呂思勉自言，一生的思想經歷了三次變化：從信奉儒家到信服法家，最後服膺馬列主義。他少時最信儒家學說，嚮往社會大同和空想的大同主義，如他自己所說：“束髮受詩書，頗聞大同義”<sup>⑦</sup>，“此時所篤信而想望者，爲大同之境及張三世之說”，認爲世界愈變必愈善，“終必至於大同而後已”。十七歲以後進入了第二期——服膺法家學說。而這次思想經歷的重要變化，即是通過管達如“獲聞

<sup>①②③④</sup> 呂思勉：“殘存日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357、15、29、28、29頁。

<sup>⑤</sup> 呂思勉：“臨江仙 壬寅舟泊丹陽次詩舲韻”，《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697頁。

<sup>⑥</sup> 呂思勉1942年11月14日《日記》稱：“達如生日似系舊曆三月二十一日，猶記其二十一歲生日詞”云云。兩說略有不同，可能是呂思勉記憶有誤。但大體應是在4—5月間（《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229頁）。

<sup>⑦</sup> 呂思勉：“再示榮女”，《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691頁。

其說”的。當時他“但以改善政治，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耳”，而要改善社會政治，則非依靠法家學說不可。而法家之說，細別之又可分為法、術兩派，而其所服膺者，尤為術家。此時循中國舊說，以為凡事皆當藉政治之力改良之，然政治上的弊病，則皆由於在執者之自利，“故非有督責之術，一切政事，皆不能行；強行之，非徒無益，且又有害”。<sup>①</sup>因而在思想層面上，管達如對呂思勉也是有所幫助的，或者說通過探討，互有啓發助益之功。

1903年3月，管達如因父親管元善在福建任職，也隨至福建。當時呂思勉曾有送別之作。據呂氏《殘存日記》記載：“是歲二月初一為予二十初度，曾成絕句十首……是月，達如之福建，送以五律四首，今尚記‘似水一心白，飛蓬兩鬢青’二語。”<sup>②</sup>在呂氏《日記》中，還有一段關於鼠疫的記載，其中談到：“鼠疫福建久有之，皆腺鼠疫也。……予從母諱綺，字少霞，適管凌雲先生，諱元善，官福建”云云<sup>③</sup>，可知其姨母程綺也曾隨其夫在福建任上。此後，呂思勉與管達如兩人仍保持有通信關係。<sup>④</sup>

關於管氏在這段時間的具體情況，因史料缺乏，尚不十分清楚。僅知他為府縣學的生員，經地方學政選拔，送入京師國子監而為貢生。宣統二年（1910），管氏以拔貢出身，經朝考複試後任為七品小京官。據《政治官報》1910年第980號《拔貢複試名單》，他在江蘇二等三十五名名單之中。《政治官報》第994號《拔貢複試名單》，為江蘇一等十五名。第1007號《政治官報》“諭旨”云：“七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此次考取八旗及各直省拔貢生紹志、世信……管聯第……等一百四十九名，著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學習。”又，《政治官報》第1024號“宮門鈔”中《拔貢錄用小京官分部制簽單》，記錄“管聯第，吏部”。可知他以七品小京官分在吏部任職。而據《宣統三年冬季職官錄》“法部衙門”中有關“七品小京官”的記載：“管聯第，江蘇陽湖縣人，拔貢。”<sup>⑤</sup>可知他於宣統末年在法部任職。

據《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記載，此時呂思勉一直在家鄉常州、蘇州、南通一帶任教。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呂氏往來蘇、常、滬、寧半年。1912年起，即受聘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教書。至1914年7月，轉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這一時期管達如也在上海任職，於是兩人又相聚滬上。

在上海期間，管、呂兩人又有一段重要的因緣交往。1912年《誠之詩稿》有《偕詩舲、達如遊某氏園》，詩云：“軒軒松柏千尋舉，宛宛櫻桃一樹垂。……難得傾杯同寫意，無妨騎馬夜深歸。”<sup>⑥</sup>也正是在這一年，管達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說小說》一文。次年，呂思勉又有《三十初度與達如、千頃、捷臣飲滬上酒家》、《後三日複集》兩詩。前一首寫道：“悲歡漸入中年境，憂患方知學道難。……偶抒狂論疑河漢，各有新詩共肺肝。”後一首中又稱：“豈以知音少，而疑吾道非。相逢二三子，亦足解憂唏。”<sup>⑦</sup>從詩中所述“難得傾杯同寫意，無妨騎馬夜深歸”，以及他們二三子相逢，互稱“知音”，可見他們當年的交遊情況及青壯年的豪氣與情懷。值得一提的是，1914年春夏間，呂思勉與詩友管達如、汪千頃、趙敬謀、丁捷臣等都在上海，於是他們又一起共結詩社，取名“心社”。如呂思勉所說：“甲寅春夏間，達如、千頃、敬謀、捷臣俱客海上，共結詩社，亦半月一集。……凡二十七集而中輟。”<sup>⑧</sup>呂氏撰有《春江花月曲》等，有“天涯淪落同為客，海角棲遲最斷魂”之句。<sup>⑨</sup>當時他們已漸入中年，人生感悟已

① 呂思勉：“自述”，《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39頁。

② 呂思勉：“殘存日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31頁；又見呂思勉《蒿廬詩稿·二十初度》，“似水”作“似冰”（《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656頁）。

③ 呂思勉：“日記七·鼠疫”，《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31頁。

④ 據呂思勉母親程楨丁未年（1907）日記載：七月初八日（8月27日），“晴。聯侄來，芸致達如書”。同年十月十一日（11月16日）載，“得達如書”（手稿本，無頁碼）。芸，芸兒，呂思勉的小名。又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呂思勉作有《風箏》詩，註云：“此亦社作，頗為達如所賞。”

⑤ 內閣印鑄局編：“宣統三年冬季職官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290冊，第410頁。

⑥ 呂思勉：“偕詩舲、達如遊某氏園”，《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661頁。

⑦ 呂思勉：“三十初度與達如、千頃、捷臣飲滬上酒家”、“後三日複集”，《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661頁。

⑧ 呂思勉《詠史》詩後跋語，並可參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第70頁。

⑨ 呂思勉：“春江花月曲”，《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665頁。

多，故而有此感歎。在這段時期，他們投契相友，交往密切，在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

1916年，管達如之父管元善逝世，呂思勉《日記》中有如下記載：“管凌雲姨丈民國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舊曆十月二十卒。（《祭儀備件》）”<sup>①</sup>呂氏作為後輩，還送了祭儀。大約在管父逝世之後，管達如即到北京任職，為財政部職員，後任財政部賦稅司第五科科長。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他一直在北方的北平、天津等地居住任職。

據1918年5月“財政部令”：“清查官產處第一股主任高桐調充第三股主任，管聯第調充第一股主任，此令。（五月八日）”<sup>②</sup>1919年2月《政府公報》，有“本部清查官產處主任僉事上行走管聯第、薛光鍊……以上三十六員擬請給四等金質獎狀”的記載。<sup>③</sup>1921年12月底，《政府公報》關於財政部厲行減政、裁汰冗員的檔中，又有“管聯第仍派充賦稅司科長”的指令。<sup>④</sup>1922年9月24日《政府公報》中載“大總統令”：為財政部五等編纂僉事官事，“令署財政總長羅文幹呈請敍本部編纂僉事官等由，呈悉翁守謙、向維楨、徐行恭、任文燦、管聯第均准敍五等，此令”。<sup>⑤</sup>1923年9月“大總統令”又云：“署財政總長張弧呈請任命任文燦、管聯第為僉事，均照準。此令。”<sup>⑥</sup>從這些記載來看，這一時期管達如歷任清查官產處主任僉事、財政部賦稅司第五科科長、五等編纂僉事官等職。

在此期間，雖然兩人南北睽隔，但相互間音問不絕。在呂思勉遺物中，還留有1921年管達如致呂氏的兩封信。其中一函言此年10月3日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代表赴總統府請願之事，“誠之吾弟：頃接二十手書，備詳種切，收到《六書論》之覆信，業已早到。京華現狀頹唐無聊，卻亦未有他故，惟昨聞津浦路斷，尚未知是何緣因。財部本部俸給，現尚無欠，僅須衍期半月耳。教潮並未平息，現有代表赴滬，或在南有所經營”云云，以下具體敍述了代表赴總統府請願之事。另一函寫於12月1日：“誠之吾弟賜覽：奉十一月廿七手書，備悉種切。……中交事弟所知者為表面之原因，其實乃交系人物，因葉氏不容於斬閣，日思報復，乃乘大會開幕，藉共管之說，散佈流言。……今既在擠兌之時，勢非塊塊有聲不可。此事籌集非易，然又不敢公然說出。因一說出，則擠兌中交之事，勢必牽及擠兌東交民巷各銀行，北京市面固必大亂，而彼之權利根基將因之俱傾”，“照上所論，風潮發生，而官吏束手，實所當然”。<sup>⑦</sup>此信長達二千餘言，頗可見當時北京政治內情和金融風潮，甚至於醞釀由太平洋會議共管之說。後一信中還講到呂思勉治病之事，故還附有時為中醫的其弟管文如所開的藥方。由上述兩信來看，兩人雖然分居南北，晤面的機會很少，但他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關係，互通款曲，情誼不減當年。而呂思勉之所以保存着這兩封信，則是他後來作為史家，因其中保存了有關政治、社會史有用的史料。

在任職財政部賦稅司期間，還曾發生他因被人告發失職而被看押的事件。據1923年11月20日《申報》，有《財部科長盜發執照之敗露》的報導，其中說到北平西單石虎胡同蒙藏學校原為明朝吳三桂舊宅，係財政部官產，後被廉價拍賣，牽涉到管理此案之賦稅司第五科科長管聯第頒發執照之事，故下令“將管聯第發交該部巡警看管查辦”。報導稱，“管大有受賄盜發執照嫌疑”，“應移交法庭嚴辦”云云，並以“拍賣蒙藏學校黑幕”、“管聯第交巡警看管”為副題，披露了這一事件。<sup>⑧</sup>此後三日的《申報》，又以《管聯第被押經過》、《財部盜發執照案之重大》、《財部科長盜發執照案昨訊》為標題，連續報導了這一事件的詳情。雖然此後《京報》又

<sup>①</sup> 呂思勉：“日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60頁。

<sup>②</sup> 《財政月刊》54（1918）。

<sup>③</sup> 《政府公報》，第1097號（1919年2月）。

<sup>④</sup> 《政府公報》，第2103號（1921年12月）。

<sup>⑤</sup> 《政府公報》，第2358號（1922年9月）。

<sup>⑥</sup> 《政府公報》，第2710號（1923年9月）。

<sup>⑦</sup> 呂思勉遺物，兩信收藏在其掌故札記內。

<sup>⑧</sup> 《申報》1923-11-20。

發表了《管聯第緊要聲明》，稱此案“報傳關於鄙人經手各節，諸多不實”，故特此聲明，以說明“本案經過之實在情形”，但管氏仍以“有乖職掌”而被免職。<sup>①</sup>

經此事件，1930年代之後，管達如轉任中央銀行天津分行文書課主任。據《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全國銀行年鑑》，在“各地銀行調查”河北省下記載，中央銀行天津分行設立於1931年4月，地址在英租界中街9號。當時重要職員有：“經理卞肇新，副理兼會計課主任俞丹榴，文書課主任管聯第。”<sup>②</sup>據現存1935年其弟管文如自北平致呂思勉兩信，此年3月15日信云：“誠之大哥尊鑑：頃由家兄轉到手示，讀悉種種，承示企元病症，並經一大嫂屬買龍虎丸”云云，又說到“家兄另有書已逕寄矣。專復敬請尊安”。<sup>③</sup>此年7月3日信中說：“誠之大哥尊鑑：久不奉手示，頗深企繫。……家兄昨日以銀行半年決算例假旋平，來書業已閱悉矣。舍下一均安，足以告慰。專此敬請尊安。”信中稱“家兄昨日以銀行半年決算例假旋平”，可知管達如此時曾因決算“例假”而返回北京之家。由此可知，這一時期呂思勉與管氏兄弟還保持着密切的書信往來。此後直至1941年10月逝世，管達如一直在天津中央銀行分行任職。

在這段時期，管達如主要從事財經方面的工作，似乎沒有關於文藝方面的撰述。這一期間他與文字工作有關的，僅是他與人合作纂輯過《陸宣公集》。據董士恩撰《陸宣公全集序》說：唐人陸贊文集的註釋鮮有善本，民國“十六年，士恩督榷煙酒，涇洪雲奇、武進管聯第在幕中，屬纂公集二家註，成書廿巨冊。常熟胡文藻考查煙草專賣，歸自日本，以所得寬政間石川安貞註《宣公集》為贈，視兩家尤詳。擬增入，管君忽沒，洪君出宰邑。遷延至廿八年津水災，所蓄圖籍在巨浸中，水退，殘敗不可理，公集餘數卷耳。卅年，洪君卸職歸，屬重編，隨時付刊……為二十六卷”。<sup>④</sup>據查有關資料，董士恩（1877—1949），字幼時、右岑，江蘇銅山人。1927年3月署全國煙酒事務署督辦，同年6月，任北京政府財政部次長。1928年兼全國煙酒事務署督辦，同年去職。據文中所說，當1927年董士恩任全國煙酒事務署督辦時，管達如曾為其幕屬，在其手下任事。董氏曾囑洪雲奇和管達如兩人纂輯《陸宣公集》，成稿二十冊。後擬增入日本寬政間石川安貞的《宣公集》註本，但因管氏突然逝世，洪雲奇出任縣長，此事暫時擱置，直至1941年後纔重編刊行。

1941年10月21日，管達如因病逝世。據呂思勉《殘存日記》載：“（管達如）民國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逝世（舊曆九月初三）。”<sup>⑤</sup>管氏逝世之後，呂思勉一直感懷不已。1942年11月14日《日記》記載：余之弟婦檢舊物，得達如扇一柄，“乃其十歲時，洪蔭之所贈詩，書畫皆蔭之所為也。……後有識語云：‘達官世講岐嶷好學，今歲為十齡初度……輒援古人之例，題扇為贈……’達官者，達如小字；辛卯，光緒十七年也。此詩昔與達如談及蔭之時，達如曾口誦之，予久忘之矣。今一觀之，恍然能憶。詩書畫俱不佳，然蔭之以殺宋教仁事聞名，此扇亦可寶矣”；並講到，“猶記其二十一歲生日詞云：‘鬢齡荏苒隨春去，誰伴得，愁人住，溟海游塵江上路，怎生消遣？斜風細雨，廿一番春莫。’其下半闋，則予忘之矣。詞殊跌蕩有致也”。<sup>⑥</sup>此後，直至1944年，呂思勉在為其日記《強為善記序》中引孟子“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之語，將此年日記名之為《強為善記》，說道：“予嘗欲以‘強為善’名齋，求達如作記，達如許之，未果，而達如化為異物矣，傷哉！”<sup>⑦</sup>綜計管、呂自1900年青年時代初識起，兩人的關係持續了四十餘年，其間交誼之厚、感情之摯，數十年如一日，至死不衰，殊為難得。

① 分別見《申報》1923-11-21、1924-01-04。

②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全國銀行年鑑》（1937），第10章，第66頁。

③ 呂思勉遺物。管文如寄自北平，前一信未署“弟文敬上三月十五日”，後一信未署“弟文敬上七月三日”。信封題“江蘇常州城內十字街十號呂誠之先生台啓，北平象來街管文如寄”。民國廿四年七月三日十八時寄出，郵戳北平（二十二）Pecking (22)，江蘇武進七月六日。

④ 董士恩：“陸宣公全集序”，《陸贊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附錄卷2，第836頁。

⑤⑥ 呂思勉：“殘存日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229、228—229頁。

⑦ 呂思勉：“日記二·強為善記序”，《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257頁。

作為近代著名的小說理論批評的作者，雖說管達如祇有一篇《說小說》這樣的專論，卻是一位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人物，以至各種近代文學史、小說史論著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的名字。然而，有關他的生平事蹟，過去卻罕為人知。故這裏爬梳文獻，不厭其繁，多方引證，略考之於上。

## 二 《說小說》與《小說叢話》的因襲雷同問題

由於管、呂兩文被稱為是辛亥時期最為系統的小說研究專論，所以研究者自然會注意到兩文在思想、內容乃至文字論述上的因襲雷同問題。例如，《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均指出：商務印書館印行《小說月報》後，與之相對壘的中華書局隨之刊行了《中華小說界》月刊，1914年第3—8期連載了署名“成之”即呂思勉的《小說叢話》。呂著作為一氣呵成的近代最長的一篇小說論文，洋洋三萬六千餘字，“是明顯針對管達如的《說小說》而發的。它論述的範圍與《說小說》大致相同，個別段落的語言也有因襲的痕跡，但主要還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運用不同的觀點，作更為深入的分析。因此，它實際上是一篇與《說小說》爭鳴的文章，在一些地方對《說小說》的觀點有所發展”。<sup>①</sup>其他的一些專著與論文同樣注意到這一問題，如《近代小說理論批評流派研究》一書即指出：“它明顯是針對管達如的《說小說》而作的，兩篇文章不僅論述的理論範圍大致相同，個別段落和語言也頗為相似。”<sup>②</sup>

如果認真考核管達如《說小說》與呂氏《小說叢話》的文字，確可發現兩者在論述方面的相似之處。兩文不僅僅是“個別段落和語言”的“因襲”和“相似”，而是有相當多的重疊，甚至其中文字也多有雷同沿用之處，或者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改寫。例如，管著《說小說》第三章開頭在談到小說之勢力及風行的原因時說道：

今試一遊乎通都大邑之書肆，則所陳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說矣。又試入窮鄉僻壤，則除小說外，他項書籍，殆不可得見焉。與村夫野老婦孺子談，彼其除小說以外無所知，無足怪也。即學士大夫，號為通古知今者，其於小說，亦複津津樂道。<sup>③</sup>

而呂思勉《小說叢話》一開頭便說：

今試遊五都之市、十室之邑，觀其書肆，其所陳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說矣。又試接負耒之農、運斤之工、操奇計贏之商，聆其言論，觀其行事，十之八九，皆小說思想所充塞矣。不獨農工商也，即號為知識最高之人士，其思想，其行事，亦未嘗不受小說之感化。<sup>④</sup>又如，兩文均談到小說的分類問題，這方面的例子就更為明顯。管達如在《說小說》第二章中專門論述了“小說之分類”。首先，他根據語言形式的不同特點，將小說分為“文言體”、“白話體”、“韻文體”三種，而韻文體“復可分為兩種：一傳奇體，一彈詞體是也”，稱之為“（甲）文學上之分類”。其次，他據文章結構和敍事方式，對小說進行“（乙）體制上之分類”，分為“筆記體”和“章回體”兩大類。最後，根據小說不同的故事題材，將小說從“性質上”分為九個種類：武力的（亦可名為英雄的）、寫情的（亦可名為兒女的）、神怪的、社會的、歷史的、科學的、偵探的、冒險的、軍事的，並結合它們各自不同的特徵，作了一番簡要的評述。對照呂著，其中稱“小說之分類，可自種種方面觀察之。第一從文學上觀察，可分為如左之區分”云云。首先，它沿用管氏的做法，將小說分為“散文”和“韻文”兩大類，散文下又分“文言”和“俗語”二門，而韻文又分為“傳奇”和“彈詞”。其次，在具體分類法上，將小說也分為

<sup>①</sup> 王運熙、顧易生 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第709頁；《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冊，第565頁。鄒國平、黃霖編著的《中國文論選·近代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下冊，第858、859頁）也認為：呂思勉的這篇論文，明顯地是針對管達如的《說小說》而發的，實際上是一篇與《說小說》爭鳴的文章，在一些地方對《說小說》的觀點有所發展，“同時，《小說叢話》用了很多筆墨來修正和補充《說小說》的小說分類”。

<sup>②</sup> 劉良民、黎曉蓮、朱殊：《近代小說理論批評流派研究》，第251頁。

<sup>③④</sup> 鄒國平、黃霖 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789、805頁。

九類：“一、武事小說”（“可稱爲英雄的”），“二、寫情小說”（“亦可謂之兒女的”），“三、神怪小說”，“四、傳奇小說”，“五、社會小說”，“六、歷史小說”，“七、科學小說”，“八、冒險小說”，“九、偵探小說”。兩相對照，祇是後者少了“軍事小說”，多了“傳奇小說”，其餘八類基本一樣，而且排列順序也大致相同。故有不少論著認爲，其論述範圍大致相同，而呂著的“分類明顯地借鑒了管達如的觀點”；“事實上，其觀點，與管達如也大致相同”。<sup>①</sup>或指出，“在小說具體分類方面，呂思勉和管達如的觀點是基本相同的，理論創見不多”<sup>②</sup>。

實際上，在具體論述方面，還可發現不少文字上的相似性。這裏以列表的形式說明之，請看以下的一組對照文字：

管達如《說小說》	呂思勉《小說叢話》
一、武力的 亦可名爲英雄的，若《水滸傳》其代表也。此派所長，在能描寫武健俠烈之人物，以振作社會尚武之精神。	一、武事小說 此種小說，可稱爲英雄的……其最著者爲《水滸傳》。……此種小說，可以振作起國人強健尚武之風。
一、寫情的 亦可名爲兒女的，若《紅樓夢》其代表也。……但爲之者多不知道德爲何物，且亦絕無高尚之感情，非描寫一佻達無行之人，號爲才子，則提倡淫樂主義，描寫富貴之家，一夫多妻之惡習，使社會風俗，日趨卑污，罪不可勝誅矣。	二、寫情小說 此種小說，亦可謂之兒女的，與英雄的小說，同佔小說中最大多數。……此種小說，其劣者足以傷風敗俗，導人沉溺於肉慾，而無複高尚之感情，害莫大焉。……其卑劣之點云何？曰寫男女之愛慕，往往與世俗富貴利達聲色貨利等卑陋之嗜好相聯帶也；曰一夫多妻也。……一夫多妻，富貴利祿，皆有害於純潔之甚者也。
一、社會的 此派小說，以描寫社會惡濁風俗，使人讀之而知所警爲主義，若《儒林外史》其代表也。最爲有利無弊，但佳作不數覩。……故欲作此種小說者，道德心必不可缺。	五、社會小說 此種小說，以描寫社會上腐敗情形爲主，使人讀之而知所警戒……如《儒林外史》及近出之《官場現形記》等，其適例也。……此種小說，自主義上論之，誠爲有利無弊，但其佳否，當以（一）作者道德心及觀察力之高低；（二）有無文學上之價值爲斷。
一、歷史的 此派小說，其所敘述事實之大體，以歷史爲根據……大抵真者一而僞者九，若《三國演義》其代表也。……苟得好讀雜史之人，刺取一時代之逸聞軼事，經緯組織，著成一書，使覽者讀此一編，如畢讀多種之野史，則於學問亦未始無益。	六、歷史小說 如《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等，全部皆根據於歷史者是也。……作歷史小說者，若能廣搜某時代之逸聞軼事，而以小說之體裁組織之，寓考訂論議之意，於怡情適性之中，雖不能稱爲純文學，在雜文學中，自不失爲傑構也。
一、偵探的 此種小說，亦中國所無，近來譯事盛行，始出見於社會者也。中國人之作小說也，有一大病焉，曰不合情理。其書中所敘之事，讀之未嘗不新奇可喜，而按之實際，則無一能合者。	九、偵探小說 此種小說，亦中國所無，近年始出現於譯界者也。中國人之著述，有一大病焉，曰：凡事皆凌虛，而不能徵實……諸如此類，不合情理之事，殆於無書不然，欲舉之，亦不勝枚舉也。

文字上如此類似，以今天嚴格的標準來說，甚至可以說不無“抄襲”的嫌疑。

① 王運熙、顧易生 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第713頁；又，《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冊，第567頁。

② 劉良民、黎曉蓮、朱殊：《近代小說理論批評流派研究》，第251頁。

二〇一六年 第一期

至於兩者在思想、論述乃至用語上的一致性，也不鮮見。例如，管著此節指出：“英雄、兒女、鬼神，為中國小說三大原素。凡作小說者，其思想大抵不能外乎此。且有一篇之中，三者錯見，不能判別其性質者；又有其宗旨雖注重一端，而亦不能偏廢其他之二種者。此由社會心理使然，不能以此衡作者之短長也。”<sup>①</sup>呂思勉《小說叢話》同樣贊成此說：“昔有人謂小說可分為英雄、兒女、鬼神三大類，此說吾極贊成之。蓋從心理上具體的分之，不過如此。英雄一類，所以描寫人之壯志；兒女一類，所以描寫人之柔情，屬於情的方面；鬼神一類，所以饗人好奇之性，屬於智的方面。其餘子目雖多，皆可隸屬於此三類中也。”<sup>②</sup>又如，管著在第四章談到：“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凡事空談玄理則難明，舉例以示之則易曉，此讀哲學書者所以難於讀歷史也。孔子曰：‘我欲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亦謂此也。”又說：“且法語難從，異言易入。為空言以發表意見者，侃侃直陳，排斥他人之所主張，以伸張我之所主張，法語之類也。藉實事以動人者，初不必直陳其是非，但敘述事實，使讀者之喜怒哀樂，自然隨之為轉移，異語之類也。其在文學上佔一特別位置，不亦宜乎。”<sup>③</sup>呂著文中同樣也談到：“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斯言也，可為小說作一佳贊。何也？小說固不離乎事實者也。”在論述“純文學的小說”與“不純文學的小說”時，又說到：“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入乎！異語之言，能無說乎！’法語之言，智的方面之事也，非文學的也；異語之言，情的方面之事也，文學的也。”<sup>④</sup>兩者所引述的孔子之語以及“法語”、“異言”等詞彙，也都是相同的。

按照一般的理解與認識，判斷兩者之間的關係，祇要看看文章發表的時間順序即可作出。就時間先後來說，呂氏《小說叢話》發表於1914年《中華小說界》第3—8期，晚於管達如兩年，無疑是呂著因襲了管著的論說。然而，問題並不那麼簡單。認真地思考一下，便不難發現這裏顯然存在着一個內在的矛盾：既然如論者所說，呂文是“明顯針對管達如的《說小說》而發的”，實際上是一篇“與《說小說》爭鳴的文章”，那麼，為什麼他又要因襲爭鳴對象文章的觀點乃至文字呢？那豈不會胎人以口實嗎？反之，其文中既襲用了前者，乃至有些段落和語言也“頗為相似”，那麼，它又是否真如論者所說的那樣，明顯地是針對管氏而發，實際上是一篇與之“爭鳴”的文章呢？這總不免使人心存疑惑，頗為費解。

如果說，前此因不清楚管達如其人，從而張冠李戴，將其與管際安混為一談，在沒有其他資料可資佐證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解說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現在既已發現呂、管之間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以兩者關係的特殊性，是否其中還另有隱情呢？或者說，這一問題是否還有待於重新研究呢？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 三 殘稿的發現及兩文之關係

呂思勉有關遺稿的發現，出人意料地讓這一公案有了一個新解。

在現存呂氏遺稿中，有一篇與《說小說》直接相關的文字材料。此文最先是作為“資料”介紹，由魏紹昌（1922—2000）披露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1982年第6輯。它以“《小說叢話》”為題，分為兩個部分：其一即呂思勉《小說叢話》的部分內容，自原文“今試遊五都之市、十室之邑，觀其書肆，其所陳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說矣”開始，至“歐美小說較之中國小說，多為單獨的，此其所以不如中國小說之受人歡迎也”，亦即連載於《中華小說界》1914年第3期其文開頭部分的文本內容。第二部分標作“（二）殘稿”，其內容包括“體制上之分類”、“性質上之

<sup>①</sup> 鄭國平、黃霖 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788頁。關於此種說法，最早有俠人的論說，“西洋小說分類甚精，中國則不然，僅可約舉為英雄、兒女、鬼神三大派，然一書中仍相混雜，此中國之所短一”〔俠人：“小說叢話”，《新小說》13（1905）。〕

<sup>②③④</sup> 鄭國平、黃霖 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824、794、819、845頁。

分類”，以及“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小說者，理想的而非事實的也”、“小說者，抽象的而非具體的也”三節文字。該文後有整理者魏紹昌所作的一段“附記”：

呂思勉，號誠之，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生前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一級教授。本文寫於清末民初之際，係呂先生早年之作。其（一）曾在當時之刊物上登載，然發表時署名僅署一“成”字，知者絕鮮；其（二）係未刊稿，幾經戰亂搬動，已殘破不全，現將兩者稍加整理發表於此，藉免湮沒。呂先生不僅精通史學，對文學、醫學、農學等均有相當造詣，本文論述小說之道，別具見地，它出現在七十年之前，尤覺難能可貴也。

此文後又收入呂著《論學集林》中的《蒿廬論學叢稿》中，1987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sup>①</sup>

經筆者比勘對照，將呂著“（二）殘稿”部分的內容與管達如撰《說小說》相比，“體制上之分類”、“性質上之分類”的內容，見於管達如著《說小說》第二章《小說之分類》；“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等三節，則見於管著第四章《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由此可見，呂氏手稿內容與管著《說小說》顯然有着密切的關係。然而遺憾的是，整理者並沒有發現其與管達如《說小說》內容上的相同，對此加以必要的說明；而後來的研究者，似乎也都沒有注意到兩者之間的這種關聯，因而長期以來均未對此作出相應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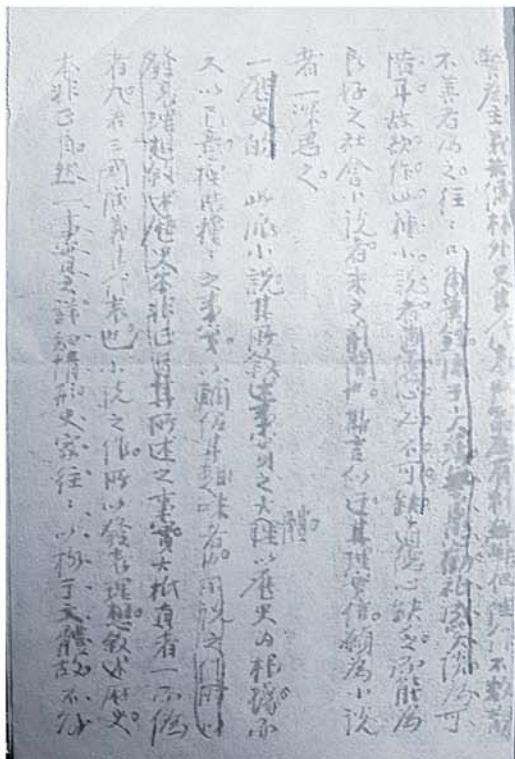
令人十分奇怪的是，管氏《說小說》的內容，怎麼會出現在呂思勉的手稿中？是呂思勉抄錄的呢，還是呂氏自己撰寫的呢？這猶如案中之案，峰迴路轉，進而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說小說》一文究竟是誰寫的？

顯而易見，如果是呂思勉抄錄的話，那麼，這一殘稿就不應收入呂著之中；而如果是呂氏自撰的話，那麼，原先人們關於管、呂兩文關係的認知和解說，就勢必要重加衡估，重新考慮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不僅關涉到該文實際的作者問題，同時也提供了新的闡釋空間，有助於回答前所提出的呂著《小說叢話》與之雷同因襲的問題。

筆者查核了呂思勉的這一手稿。按呂氏撰文，習慣用毛筆書寫，此手稿書於很薄的連史紙上，雖說原稿已殘缺不全，現僅存10頁，但由字跡辨認，確係呂氏手跡（參見圖一）。原稿紙 $16.7\times28.8\text{cm}$ ，呂氏書寫，每頁10行，行約25字。從現存呂著殘稿來看，當時整理發表的內容與原手稿還是有所差距的。

其一，管達如在《說小說》中曾從三個角度對小說進行分類：“（甲）文學上之分類”，“（乙）體制上之分類”，“（丙）性質上之分類”。而現整理出的祇有“體制上之分類”和“性質上之分類”二節，從呂氏手跡來看，手稿實作“（乙）體制上之分類”，“（丙）性質上之分類”。可能是為了保持殘稿的相對完整性，故整理者刪去了其中“（乙）”、“（丙）”的字樣。另外，在“（乙）體制上之分類”之前，還有“能如彈詞之純以七字成句，音調圓熟，便於吟誦。故此等戲劇，縱使日盛，而欲求此等劇本，以蔚小說界中一大觀，則戛戛乎其難之矣。（傳奇在

圖一 呂思勉手稿殘卷（部分）



<sup>①</sup>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6輯。呂思勉史學論著編輯組題作“小說叢話”，文末注明：“原刊《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六輯，一九八二年出版。本文作於清朝末年或民國初年。”但已無“魏紹昌附記”〔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第176頁〕。

詩歌中，最適於敘事之用。西人敘事詩，往往有長至數百千言者，在中國惟傳奇可以當之。故傳奇之體制，雖沿詞而變，而其性質，實與詞不同。昆劇雖衰，傳奇不能廢也）”一段文字。與管著相對照，此段文字即管著關於小說之分類“（甲）文學上之分類”有關“三、韻文體”最末一段的文字。由此可知，在此頁呂著殘稿前面，應該有關於“（甲）文學上之分類”論述文言體、白話體、韻文體的內容。換言之，原先呂氏手稿實際上包括了以上三項完整的內容，也即《說小說》第二章的全部文字。

其二，將呂著有關“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等三節的文字與管達如《說小說》相對照。管著此節認為，“小說與他種文學之異點”有五：（1）“小說者，通俗的而非文言的也”；（2）“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3）“小說者，理想的而非事實的也”；（4）“小說者，抽象的而非具體的也”；（5）“小說者，複雜的而非簡單的也”。查呂著手稿此節，在“一、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之前，還有“文之所長也。敘述眼前事物，曲折詳盡，纖悉不遺，此通俗文之所長也。文字之用，不外說理、敘事、表情三者。古文所說之理，所敘之事，所表之情，固非通俗文所能有。通俗文所敘之事，所說之理，所表之情，又豈通俗文所能有乎？惟如是也，故雖文人學士，深通古文者，而好讀小說，亦與常人無異矣”一段文字。此段即管著中“小說者，通俗的而非文言的也”一節末尾的文字，故在此頁呂著殘稿前面，無疑應有關於此節的內容。而此頁手稿，至“敘善人則愈覺其善，敘惡人則愈覺其惡，敘可愛之物，則愈覺其可愛，狀可憎之態，則愈覺其可（下缺）”而止，下缺的文字為“憎，其使讀者悲喜無端，涕流交集，宜矣”。故由此還可推知，以下應還有“小說者，複雜的而非簡單的也”一節文字。如此，手稿實涵蓋了《說小說》第四章的所有內容。

就以上兩點而論，呂著殘稿實際上包括了管達如著《說小說》第二章“小說之分類”和第四章“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的基本內容。經比勘，除極個別文字外，呂著殘稿與管達如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說小說》的文本是完全相同的。

如此驚人的一致，當然不是偶然的，對此有兩種可能的解釋：（1）呂著殘稿是抄錄管著《說小說》的有關內容，為其撰寫《小說叢話》作資料準備；（2）此文本身就是呂思勉撰寫的。從論證的嚴密性來說，自然不能排斥存在着前一種可能性。然而，從手稿本身來看，證以相關的材料，回答則是否定的。

首先，從呂著手稿來看，其中有不少修改之處。如關於歷史小說，手稿在“以輔佐其趣味者也”之下，原有“小說之作，所以發表理想，敘述歷史，本非正旨”幾句，後用墨筆刪去。而在稍後“若《三國演義》其代表也”句下，又重新寫上了此數句。如果是呂氏抄錄管著《說小說》的有關內容，那就不應該有塗抹修改的痕跡。個別文字的修改，如文中引“孔子曰：‘我欲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亦謂此也。”呂氏手稿原作“不能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圈去“能”字；“水火陰陽，相生相滅，莫或措意”句，手稿中“陰陽”作“陰易”，“滅”作“威”，末句原作“人莫或措意”，後又圈去“人”字；“此派小說，其所敘事實之大體”一句，“大體”手稿原作“大理”，後圈去“理”字，旁添“體”字。手稿中還有多處寫了一半的字，如“而言描寫之能否入微”句，其中“言”字寫了半邊，即圈去。這些改動也難以用呂氏抄錯後再修正來加以解釋。

其次，在呂氏手稿的字旁，還有許多圈圈點點的標記，以及用紅筆書寫的圈號及分隔號等。例如，其論小說分類，分為“社會的”、“歷史的”、“科學的”、“偵探的”、“冒險的”等，其旁均以紅線標出，而最末“軍事的”三字，則直接以紅筆寫就。又如，文中論述“其極遂變為強盜主義”，“強盜主義”四字即用紅筆分隔號劃出；“非描寫一佻達無行之人，號為才子，則提倡淫樂主義”云云以下至“罪不可勝誅矣”句，在“佻達無行之人”以及“則提倡淫樂主義，描寫富貴之家，一夫多妻之惡習”處，均旁加紅線。至於字旁的圈圈點點，猶如以前文章

的圈點，標出文中警拔之處，以示重要。如呂思勉《章句論》所說：“圈點之用，所以抉出書中繁要之處，俾人一望而知。”<sup>①</sup>經與《小說月報》刊載的《說小說》相比勘，手稿與其是相同的。若手稿是呂氏抄稿的話，則祇要抄錄內容即可，而不必將其旁的圈點符號也一同錄下。

再次，從注文的格式來說。如上引管氏《說小說》有“（傳奇在詩歌中，最適於敘事之用”至“昆劇雖衰，傳奇不能廢也）”一段文字，以及“（如關羽有何價值，而舉世奉爲神明，非《三國演義》使之然否）”，兩處都是註釋性文字。《小說月報》刊行時，其字形大小都與正文相同，但前後以括弧“（ ）”註出，以示區別。查呂氏手稿中，以上兩處均以雙行小字夾註的形式出現。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序例》中曾稱：“雙行夾註，爲吾國書中最善之款式，可使首尾完全，而眉目仍清醒。”並謂：“本書用雙行夾註處，與用夾句號處不同，並請注意。”<sup>②</sup>此文在《小說月報》刊載時，顯然是依據手稿而變通排印的，即將原雙行小字的註釋變爲正文字體，而以括弧“（ ）”註出。若手稿是據《小說月報》上《說小說》一文抄錄的話，則當仍其舊，而不會作雙行小字夾註的形式。從呂著發表在《中華小說界》上的《小說叢話》來看，其中註釋性文字也均作雙行小字夾註，與此殘稿之註的格式是相一致的。<sup>③</sup>故就此而言，也可證此爲呂氏所撰的手稿。

另外，從文字異同、用語習慣等來說。《說小說》文中講到小說“故其意味，較之自然之事，常加一倍之濃深”，呂氏手稿作“校之自然之事”。此處“校”字似誤，但據呂著《小說叢話》中有“小說所描寫之社會，校之實際之社會，其差有二”云云<sup>④</sup>，而查《說小說》中又有“矯正社會惡習之功力校小也”，談到譯本小說，“然校之我國人所著，則其功用必不可同日而語矣”，呂氏手稿也皆作“校”字。<sup>⑤</sup>可見“校”字是呂氏的一種習慣用語。又，在手稿中還有一些異體字，如“實與詞不同”句，“實”字手稿中作“寔”；而“實有無限之便利也”句，手稿與《小說月報》則又均作“實”字。如“筆記體”，手稿中作“筆記體”，又有“章回體此體之所以異於筆記體者”句，三個“體”字寫法不同；“於社會無絲毫之益”句，手稿中寫作“絲豪”。以上“寔”、“體”、“豪”三個異體字，顯然是《小說月報》印行時改過來的。凡此，也可說明手稿並非照抄《小說月報》上《說小說》的文字，而是反過來應在刊登時作了更動。

另，“蓋由吾國科學思想不發達故也”句，手稿作“蓋由吾國人科學思想不發故也”，其中有二字不同。再如手稿有“二、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從此文來看，在此段上下均作“一、小說者，理想的而非事實的也”，“一、小說者，抽象的而非具體的也”。此幾處“一”皆爲識別字號，而非表示數目的“一”字，故此句亦當作“一、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此處手稿作“二”，顯然因承前之“一”而致筆誤。而《小說月報》發表時，同樣也誤作“二、小說者，事實的而非空言的也”。

基於上述理由，故可排除呂氏手稿是抄錄自管文其中內容的可能性。而通過以上的考辨，更可獲資證明，呂氏手稿即爲其自身所撰寫。確認這一點，對於進一步弄清《說小說》一文實際的寫作情況，乃至研討管、呂兩文之間的相互關係至關重要。我們知道，管著《說小說》共六章，如此說來，至少其中的兩章爲呂思勉所撰。換言之，原先一直掛在“管達如”名下的管著《說小說》一文，實際上並非管氏一人所撰，呂思勉也參與了寫作，是重要的合作者。也就是說，《說

① 呂思勉：《章句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第67頁。

②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第4頁。呂著《章句論》也說：“夾註之法：近人於兩端加一直，或加括弧。或於有註之處，加註一註二等字，而註則並寫於後。實不如舊式雙行書寫，即寫在加註之處爲得。以兩直及括弧易奪，雙行與大字難認。夾註及正文相隨，讀時不勞翻檢；另書於後者則不然。若欲先讀正文，後讀註語，雙行大字，眉目亦極清晰；括弧兩直及旁註小字，均較難尋覓也。”又說：“註語兩端加括弧，不如雙行夾註之善。然古書註語與正文相混者，卻可以此別之。”（第65、66、68頁）。

③ 如呂著《小說叢話》中論述“今文學則小說其代表也，且其位置之全部，幾爲小說所獨佔”，其下有“吾國向以白話著書者，小說外，殆無之。即有之，亦非美術，性質不得稱爲文學”一段註釋性的文字，即是採用雙行小字夾註的形式〔《中華小說界》3（1914）〕。

④⑤ 鄒國平、黃霖 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825、796頁。

二〇一六年 第一期

小說》一文是管達如、呂思勉兩人合作撰寫的產物。

而且，還必須充分考慮到如下情況，即現存呂思勉的手稿已是殘稿，僅存10頁。由此也給人以新的啓示，如果是首尾完整的稿子的話，那麼，是不是可進而作這樣的推測，或者說還存在着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說小說》一文是由呂思勉所撰寫，而以管達如的名義發表的。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麼，管達如祇是名義上“署名”的作者，而此文真正的作者則是呂思勉。

這樣的推論並非全然無所依據。以呂氏手稿為證，其中兩章既然為呂思勉所撰，且不能排斥其餘四章他也參與其中，由呂著《小說叢話》與之相校，即透露出這方面的蛛絲馬跡。以手稿之外的第三、六章而論，如《說小說》第三章論及“小說之勢力及其風行於社會理由”，除前引“今試一遊乎通都大邑之書肆”一段文字兩者相似之外，還講到“此小說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使其人之行為性質，隨之而生變化者也。如右所述，則小說之勢力，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其功用，則雖至嚴密之法律，至精微之宗教，殆不足以勝之，亦可謂偉大矣”。<sup>①</sup>而呂著《小說叢話》也稱道：“此其所以風行社會，其勢力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也。”<sup>②</sup>《說小說》又謂：“披土人之孜孜矻矻，窮年不倦者，何為乎？又由十年窗下，一舉成名等狀元宰相之小說，以為之誘導也。”<sup>③</sup>並說到：“抑小說之作用，又有一焉，曰：堅人之自信力。”<sup>④</sup>而呂著也稱，小說能“鼓勵人之勇氣，而堅其自信之力者，其功大矣。‘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此窮儒之所以蹭蹬場屋，歷數十年，而終不肯棄其青氈也”<sup>⑤</sup>。這裏“水銀瀉地”及“十年寒窗”之喻，都是相同的。

又，《說小說》最後第六章談到作小說者“文學宜求高尚也”，“道德心宜充足也。稽古說《詩》，曰‘不得已’，作《易》曰‘其有憂患’。凡著書立說者，未有不具悲天憫人之衷，而其書能有益於社會者也”。<sup>⑥</sup>呂著《小說叢話》中也談到：“第一理想要高尚。……凡人之道德心富者，理想亦必高；道德心缺乏者，理想亦必低。……稽古說《詩》，曰‘不得已’，豈必雅頌，皆由窮愁。不得已者，有其悲天憫人之衷，自有其移易天下之志”，“作小說亦猶是也”。<sup>⑦</sup>並謂：“無悲天憫人之衷，決不能作《紅樓夢》。”“但作者須有道德心，且須有識力。……非如世之妄作社會小說者，絕無悲天憫人之衷，亦無憂深慮遠之識。”<sup>⑧</sup>兩者所引“稽古說《詩》，曰‘不得已’”，以及“悲天憫人之衷”等詞彙，顯然也是一脈相承的。

再者，《說小說》又談到作小說者：“智識宜求完備也。有道德心矣，能自主張其所見矣，而智識或不完備，則其所主張者先已限於誤謬，其貽害於社會者亦必非淺鮮。……又小說之作，材料極為複雜，無論何種事實，殆無不與小說有關係者。當此等處，作者亦須有普通之智識，措語方不至謬誤。否則一言之差，貽害社會者非細矣。”又稱：“閱歷宜求廣博也。小說者所以描寫社會之情狀者也。以其文體主於詳悉，故描寫一現狀，又必有種種之現狀以輔佐之。……故作小說者……於他種社會之情形，亦不可不知也。”<sup>⑨</sup>而呂著《小說叢話》同樣談到：“第二材料要豐富。理想高尚矣，然無材料以敷佐之，猶無益也。蓋小說者，以其體例特殊之故，凡理想皆須以事實達之，故不能作一空語。……故作者於現社會之情形必不可以不知，而其知之又不可不極廣。……此作者之閱歷，所以不可不極廣也。此亦作小說最要之條件也。”<sup>⑩</sup>

這些都說明，兩者有同一性。可知不止是其中第二、四章的內容與呂氏手稿直接相關，其餘

<sup>①②③④</sup> 鄭國平、黃霖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792、806、790、791頁。

<sup>⑤</sup> 鄭國平、黃霖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815頁。這種重複運用比喻及詞句的做法，在呂思勉的論著中不乏其例。例如，《小說叢話》謂：“蓋歌詞實語言中之至美者也，如‘欲乘秦風共翱翔，又恐巫山還是夢鄉’，翻成白話祇可云：‘我很想同你結婚，不知能否如願？’成何語言乎？又如京調，人孰不知其鄙俚，然如‘走青山，望白雲，家鄉何在’，其意義亦豈能以表白之乎？……吾人所懷高等之理想，往往有能以文言達之，而不能以俗語達之者，如右所舉二例是也。”後來他在1920年撰寫的《新舊文學之研究》中即又講到：“偏執白話者，又謂文言之意，俗語無不可達，請問昆曲中之‘欲乘秦風共翱翔，又恐巫山還是夢鄉’，可翻作‘我很想同你結婚，不知能否辦到乎？’姑勿論其美不美。其意義對不對乎？即舞臺中之‘走青山，望白雲，家鄉何在？’又如何翻法乎？”（《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76頁）

<sup>⑥⑦⑧⑨⑩</sup> 鄭國平、黃霖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799、849、814、799、800、849、850頁。

幾章的寫作也與其有着內在的千絲萬縷的關聯。這種情況固然可解釋爲是呂氏後來之作吸取了前文的觀點或文字，但如果逆向思維的話，也可用以說明前文爲呂思勉所撰，故在論述、文字方面有此延續性及重疊之處。據此進而言之，如古人所說，“角者吾知其爲牛，齧者吾知其爲馬”<sup>①</sup>，舉一隅而反三，准理而推，也就不能排斥全文均是由呂氏寫成的可能性。

就事實而論，也確實存在着此文是呂思勉所撰的可能性。從呂氏一生行事來看，在其著作生涯中，也多有代人作文，甚至將自己的著作贈人之事。呂氏在青年時代，曾有一段時間對文學極有興趣。如他自己所說：“予於文學，天分頗佳”，“嗜好頗篤”。<sup>②</sup>他文思敏捷，擅長作文，在詩詞、寫作方面甚有天賦。在其《殘存日記》中，便記載着1903年他二十歲時赴金陵參加鄉試“代人作文”之事：

是年在場中，助人作文仍甚多，時同人多抱微恙也。計二場助文甫作二篇，叔源、調卿、詩舲、魯青各一篇。又有史茲德者，文甫之族人也。以文甫之請，爲作兩篇，改削兩篇。三場又爲叔源、調卿、魯青、茲德各作一篇。時文甫患恙最重，設非予允以相助，則二場即不敢入場矣。文甫謂予甚有豪氣，因此定交。還里後，又介李君滌雲與予定交云。此時予興會甚佳，雖在場中代人作文甚多，而出場仍甚早。<sup>③</sup>

此次金陵鄉試連續三場考試，他便代朋友作文十四篇。後他曾回憶道：“予少時行文最捷，應鄉舉時，嘗一日作文十四篇，爲同輩所稱道。”<sup>④</sup>自然，他在鄉試中“代人作文”之事，與此並不能相提並論，不能就此說明《說小說》一文即爲其代撰，但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有這種可能性。

此後，他還有將自己的著作予人之事。如前面提到的謝鍾英之子謝利恒，是呂思勉青年時代的友人，呂氏後於1919年入商務印書館，便是由他介紹的。其時商務印書館正籌劃編寫《中國醫學詞典》，謝家世代行醫，是武進的名醫，謝利恒即爲該書的主編。據呂思勉《自述》說，他入商務印書館後，曾“助謝利恒君編輯《中國醫學詞典》”，因呂氏舅家也世業儒醫，其外祖父母及幾位舅氏，“皆治漢學而兼知醫，故予於中國醫書之源流派別，略有所知。謝君本舊友，此時此書亟欲觀成，乃將此一部分屬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訖”<sup>⑤</sup>。後來事有變化，呂撰的這部專考中國醫書“源流派別”約五萬字的文稿，未收錄於《中國醫學詞典》。是書後題名爲《中國醫學源流論》，由謝氏以其自己的名義刻印出版。該著署名“武進謝觀利恒著”，實際上卻是呂思勉所撰。在現存呂氏遺稿中，今尚完好地保存着這一手稿，便是明證。<sup>⑥</sup>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卷首有呂思勉撰《謝利恒先生傳》，文中說：“君真奇人哉。予識君時，年未弱冠，今逾三十年矣。”還謙稱自己“於醫學則一無所知，顧君不以爲無所知，讀古醫書，或時下問，相與賞奇析疑”。文中稱道謝氏“日爲弟子討論學術，而君弟子群謀輯君言論行事，以告當世。曰《中國醫學源流論》、曰《中國醫話》、曰《中國藥話》、曰《澄齋醫案》、曰《澄齋驗方》……凡若干卷，將次第刊行”<sup>⑦</sup>。並未提到自己所著《醫籍知津》予謝氏之事。故對呂氏來說，他將自己的書稿或文稿贈與好友，並非偶然。以此律彼，如前所論，他與管達如並非泛泛之交，作爲青年時代起就結識的姻親好友，兩人意氣相契，情深誼篤，不分彼此，關係非比尋常。此時呂思勉正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教書，出於某種後人尚不清楚的原因，或者是出於友情之故，爲了助人成名，或因他本人並不願出面，故將文章以“管達如”的名義發表，也就不足爲奇。在他們看來，這祇是朋友間相互交往中的平常之事，並未慮及如今日很看重的“著作權”的問題。而就當時的風氣來

<sup>①</sup> 韓愈：“獲麟解”，《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30頁。

<sup>②</sup> 呂思勉：“自述”，《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35頁。

<sup>③</sup> 呂思勉：“殘存日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30頁。

<sup>④</sup> 《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688頁。

<sup>⑤</sup> 呂思勉：“自述”，《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37頁。

<sup>⑥</sup> 呂氏本人還保存着題爲《醫籍知津》的最初原稿，現收入《呂思勉文化思想史九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具體可參胡道靜撰《呂著〈醫籍知津〉序》。

<sup>⑦</sup> 呂思勉：“謝利恒先生傳”，《中國醫學源流論》（上海：澄齋醫社，1936），第3、4頁。後呂思勉還有《代利恒挽頌孚文》。

二〇一六年 第一期

說，在文人間代人作文或贈文與人，實也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

當然，由於資料缺失，兩位當事人也早已逝世，現在已很難搞清其間的具體真相，也無以斷然證明全文就是由呂思勉一人寫成，但有呂氏手稿為證，呂思勉至少撰寫了其中的兩章。此文由管、呂兩人合撰而成，應當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釐清了這一事實，對於弄清前面所論管、呂兩文間的因緣及為何雷同因襲也就迎刃而解，得到合理解釋了。正因為《說小說》一文由管、呂兩人合作撰成，或原本就出自呂思勉一人之手，故後來他在寫《小說叢話》時，襲用、改寫自己前面所寫的文字內容，也就是可以理解乃至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也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撰文時，便無所顧忌地運用了原來管文中諸如小說分類及相關的語句、比喻等，從而在思想、論述上顯示了某種一致性，乃至在行文方面都留下了不少明顯的痕跡。因此，就兩文的關係而言，呂氏此後發表的《小說叢話》，顯然並非如原來論者所說的那樣，是“明顯針對管達如的《說小說》而發的”，是一篇與之“爭鳴的文章”。其撰作此文，更準確地說，實際上是在先前論述的基礎上，經兩年的深入思考，感到意猶未盡，有必要再加以申說，故再次撰寫了這一長達三萬餘字的宏篇大論。在文中作了更多的論證和闡發，或修正補充，或引申發揮，以補充前文的不足，深化與完善自己這方面的認識。這表明了其思想的演化與發展。

因此，後人在考察呂著論述時，不僅應注意到其承前延續性的一面，更應關注其推進、深化的一面。後來呂氏的《小說叢話》之作，並非是前文觀點與論述的簡單重複，而是在各方面作了諸多的推進。此文最重要的特徵，便是將西方理論引入了中國小說傳統的分析中，而賦予其新的內涵與意蘊。如文中特色之一，便是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補充修正前此《說小說》的小說分類，包括“抽象的分類”和“具體的分類”兩個方面。他從理論上進行“抽象的分類”，除沿用管氏之外，又着力從敘事學的角度，從小說“所敘事實之繁簡”（複雜小說與單獨小說），教事“有主、客觀之殊”（自教式或他教式），“所載事蹟之虛實”（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等方面加以分析，並將西方悲喜劇的理論運用到小說分類之中，把小說分為“悲情小說”與“喜情小說”兩大類，悲情小說又分為“絕對的悲情小說”與“相對的悲情小說”。又將小說分為“有主義與無主義之殊”（不純文學的小說與純文學的小說），從諸多角度與層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上述這些重要論述，無疑大大增強了小說分類的理論色彩和論析深度。文中不僅對晚清以來主要的小說批評觀點作了比較系統的梳理與總結，對以往小說理論研究中的主要問題，包括自己的原先之論，都作了較前更為深入的闡發，從而拓展了其小說理論的視域寬度與理論深度。可以說，此文和之前的管氏《說小說》都代表了當時中國近代小說理論批評發展的水平，並成為近代小說理論研究的典範之作。

最後，附帶談一下呂著與其所受日本影響及其關聯的問題。學術界大多認為，《說小說》與《小說叢話》兩文的寫作受到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例如，陳平原在《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說：“到了管達如的《說小說》、呂思勉（成之）的《小說叢話》，已經明顯借鑒西方小說理論，試圖系統闡明小說的基本性質和具體特徵，建立完整的‘小說學’了。”<sup>①</sup>一些論著也稱管文“明顯地受到了西方哲學和美學思想的影響”，而呂著《小說叢話》的“顯著特點是注重運用西方美學的觀點來分析小說的性質”。<sup>②</sup>這種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為《小說叢話》中多處提到“西人”說云云，如謂“西人論戲劇，分喜劇與悲劇二種，吾謂小說亦可作此分類”，乃至有直接引用外文的，如稱“複雜小說，即西文之Novel。單獨小說，即西文之Romance”，論及“主客觀之殊”時，又說到“故亦可謂之自教式（Auto-biographic）及他教式（biographic）也”等。

<sup>①</sup> 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第230頁。

<sup>②</sup> 劉良明、黎曉蓮、朱殊：《近代小說理論批評流派研究》，第241頁。王運熙、顧易生 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第709頁；《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冊，第565頁。

## 鄒國義：破解民國初年小說理論界的一樁公案——管達如《說小說》與呂思勉《小說叢話》因襲雷同問題

等，均是明顯的例證。<sup>①</sup>然而，從其接受西方美學、文藝理論的來源及途徑來說，他與日本的關係似乎尚未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因而揭出此點並非無關宏旨，而是同樣值得引起重視。

呂思勉在《小說叢話》中寫道：“美術之性質既明，則小說之性質，亦於焉可識已。小說者，第二人間之創造也。第二人間之創造者，人類能離乎現社會之外而為想像，因能以想化之力，造出第二之社會之謂也。明乎此，而小說與社會之關係，亦從可知矣。”<sup>②</sup>認為小說作為“美術”的一種，是人類美的性質在實際中的表現，其本質決不是簡單地“摹擬”社會生活，也不是僅用“社會現象之反映”、“人間生活狀態之描寫”就能概括的。任何一種“美的製作”，都要經過“模仿”、“選擇”、“想化”、“創造”四個階段纔能最終完成。因此，小說是對客觀對象進行想像改造和藝術加工，“第二人間之創造也”。在另一處又說：“戲劇者，不惟能以角本造出第二之人間，而同時又能以歌、舞二技，刺激人之感官，以發揮其感情，而消耗其有餘勢力者也。”<sup>③</sup>其論述中多次談到“第二人間之創造”云云，便是典型的從日語轉化過來的。文中又談到：“凡文，必別有律以歌之而後能見其美者，在西文謂之Declamation，日本人譯曰朗讀。但如其文字之音誦之，而即可見其美者，在西文曰Recitation，日本人譯為吟誦。其不須歌誦，但目識而心會之，而即可見其美者，在西文曰Reading，日本人譯曰讀解。”<sup>④</sup>又一處說到：相對的悲情小說，雖也有多少之缺憾，而其結果則大抵以圓滿終結，“此等戲劇，西人謂之Reconciliation（譯言和解）”。<sup>⑤</sup>這裏將西文與日語對舉，屢次談到日人“譯曰朗讀”、“吟誦”、“讀解”、“譯言和解”等，從這些譯文術語的翻譯，同樣透露出其間的某種消息。這種複雜的關聯現象，正揭示出其與日本文學理論的某種聯絡及影響之所在。

呂氏稱自己“生平未入學校。於外文，僅能和文漢讀；於新科學，則僅數學、形學”，略有所知而已。<sup>⑥</sup>可知他在外語方面僅知日文。自青年時代起，他便熱衷於閱讀新書報，汲納新思想，連詩文都喜歡用新名詞。他曾自言：“予是時思想極駁雜，為文喜學龔定庵，又讀梁任公先生之文，慕效之。詩文皆喜用新名，史朗人姑丈嘗謂予曰：‘君之詩文，非龔即東。’（龔，即龔自珍；東，指東洋的維新思想）相與一笑而已。”<sup>⑦</sup>於此可見，他很關注日本的新思想。而據其《自述》，當時他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教書，“所教者，除應用文字外，商業經濟，商業地理，因無人教，亦無教本，皆由予參考日文書教授”，並稱這種做法，“由今思之，甚為可笑，然在當時，固各校多數如此”。<sup>⑧</sup>由此而言，他撰寫有關小說理論方面的文章，也當如他教商業經濟、商業地理那樣，“參考”了“日文書”方面的一些論著。尤其是在當時漢譯西文美學、文藝理論譯本十分稀缺的情況下，他的一些西方美學、文藝思想，是通過日文論著這個中介得來的。<sup>⑨</sup>如果注意到此，對此作進一步的抉發與研究，對於探討這一時期小說理論的多重來源和其不同渠道，當時國人對外來思想的攝取與其具體路徑，顯然是有幫助的；而尋覓考索其間的錯綜關聯，則對因此而引起的變化及其複雜性等，也可能會有更深入的認識和把握。

[作者註：此文承同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耕華提供呂思勉先生之手稿及相關材料，特此致謝。]

<sup>①②③④⑤</sup> 鄒國平、黃霖編著：《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第810、812、814、807、848、809、815頁。

<sup>⑥⑧</sup> 呂思勉：“自述”，《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35、437頁。

<sup>⑦</sup> 呂思勉：“殘存日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31頁。

<sup>⑨</sup> 關詩佩：“呂思勉《小說叢話》對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的吸入——兼論西方小說藝術論在晚清的移植”，《復旦學報》2（2008）。